

帷幕后面的法国

[法] 弗朗索瓦·德克洛赛 著

新华出版社

2756.56/1

00620

帷幕后面的法国

[法] 弗朗索瓦·德克洛赛 著
武佩清 译 闻丽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François De Closets

Toujours Plus!

(1982)

Bernard Grasset

本书由法国弗朗索瓦·德克洛赛 著、
贝那赫·克哈赛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多多益善》一书译出。

帷幕后面的法国

[法]弗朗索瓦·德克洛赛 著

武佩清 译

闻丽 校

新华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插页2张 233,000字

1985年7月第一版 1985年7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1,000册

统一书号: 3203·073 定价: 2.10元

DH56/14

译者前言

正当最近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二年）席卷西欧、法国社会党政府号召振兴经济、实现社会变革之际，这本论述法国社会不平等现象的专著（原名《多多益善》）在巴黎出版了。它轰动了法国社会，顷刻间，销售量超过百万册，一时洛阳纸贵，成为一九八二年法国最畅销的书籍。

这本书所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兴趣，是因为它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一个本质问题：经济、社会的不平等。作者是法国电视台著名的经济记者弗朗索瓦·德克洛赛，他经常在电视台上解释、评论经济问题。他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在本书中运用丰富的资料、详细的统计数字，解剖分析法国的社会。

他指出，现在存在着“两个法国”。一个是 he 所说的“特权阶层”，他们占有大量的财富。据统计，在收入方面，占四分之一的最富裕的家庭占全国总收入的一半；在财

产方面，百分之五的最富有的法国人占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三十。其中有“高级特权阶层”，包括政府高级官员、大企业的董事长兼总经理等，其特点是“财富和地位”结合在一起。除此之外，一部分自由职业者收入极高；一部分在国计民生上居关键地位的行业的工作人员，在高工资之外，还有种种优厚的福利待遇，也被作者列为享有“特权”者。

另一个是“弱小的、无组织的、被弃置于超度剥削之下的法国”，其中包括青年、妇女、外籍工人、上年岁的、没有技术的、分散和没有组织的劳动者。他们不仅工资低，而且劳动条件差，还经常遭受失业的威胁。这些处于社会下层的法国人占法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三。

作者指出，这两个法国之间鸿沟甚深，两极分化明显。作者因此得出结论，法国各地市政府大门上镌刻的铭文：“自由、平等、博爱”，“近似骗人的广告”，应当改换。

作者看到资本主义危机的深重和前途的黯淡，但是，他仍主张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他表明，他揭示法国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是由于这会影响到法国经济的发展和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且他担心，“被社会制度抛弃的人们”会“走投无路、铤而走险”。因此，他主张，通过“团结互助”的办法，使法国人“重新组成一个民族大家庭”。他设想，“把公正和效益结合起来”，建立一种“多样化”的、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命运的社会。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些主张自然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本书另有不少论述，也都出于作者自己的立场，读者当能明辨。但是，本书揭开了法国社会帷幕的一角，使读者由此能够深入了解法国社会，而且透

过法国能够看到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本质，这就是本书意义之所在。

作者在本书的写作中，广证博引，议论纵横，文笔流利，有独特的风格。译者依据原著逐章翻译，个别段落略有删节，谬误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一	法国的不平等现象	(1)
二	银行与清洁工	(26)
三	分享工作机会	(58)
四	金钱第一	(93)
五	富人集团	(124)
六	高级特权阶层	(152)
七	西方式和苏联式	(195)
八	国家保护	(217)
九	老板与工人	(253)
十	工人或雇员	(283)
十一	行业封闭的策略	(312)
十二	社会的多样化	(354)

法国的不平等现象

不平等，是法国社会的弊病，万恶之源。它是如此“严重”，以致于五千四百万法国人成了五千四百万个受歧视者。政治家们必须要减少这种不平等。由于没有履行这个义务，右派在一九八一年的（总统和议会）选举中输掉了。而由于许诺要完成这个任务，左派被拥上了台。

显而易见的是：一些人过于富裕，其他人则过于贫穷。正本求源：应该劫富济贫。

当社会党政权想要减少法国最富有的人和最贫穷的人之间的差距时，人们只能赞成和支持它。在这一点上应该是毫不含糊的。但是在这个如此微妙的领域里，善良的愿望和态度坚定的决议，是不足以保证取得好结果的。

要治愈法国的“不平等症”，就需要有正确的诊断，要对症施医。然而我看今日的情况并非如此。我担心那些不恰当、不对症和不时宜的医治办法，只能使病症转移而不能消除它，只能使身体每况愈下而不能使其复原。在治疗之

后，享有特权者的状态和头衔可能改变，而法国人则由于想得到更多的平等而变得更加不平等了。

对于一个以公正为掩护而其实主要致力于同各个最强有力的行业集团保持和平相处的社会来说，说明真实情况是不悦耳的。真实情况是，迄今的改革还只是针对占统治地位的集团的，而不是针对社会制度的。我这样做可能会使谁都感到不高兴：把一个真正的富人从阴暗处拖出来，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剥下一个假穷人的破衣烂衫；揭露出一个行业集团的各种特权；没有比这些更使人恼怒的事情了。然而，如果不采取恰当的纠正措施，如果不彻底揭露出那些孕育着和可以再产生各种不平等的隐蔽的制度，那么怎能毫无根据地真正相信可以纠正这些不平等呢？

按照社会职业分类或按收入等级划分，可以使人望一下图表就方便地了解法国的不平等。然而满足于从这种材料出发来执行一项政策，就如同以一张十六世纪的地图为指导在非洲进行探险一样谬误。诚然有一些说明是近似于正确的，但它们却是如此片面，因为它们掩饰了本质的东西。

法国人之间真正的不平等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不仅仅在金钱方面。啊！金钱是重要的，我绝不会忘记它。只是“其他的东西”也并非不重要，漏掉它们也是同样严重的。然而，正因为具有共同计算单位的会计学是简单的，所以象旧货铺的财产清单那样繁杂的不平等现象就更加无法分门别类了。

在不平等现象的旧货铺里，杂乱地堆放着岁金收入、保证价格、就业保障、退休年龄、工时和假期、工会的保护、职业的自我封闭、企业中的食堂、税务制度、工作条件、优

惠贷款、医疗保险、退休补助、社会服务、按工龄晋级、受培训和被提升的可能性、社会地位、补助金的多少……同样，从反面来说，噪音、污垢、臭味、危险、紧张、疲劳、竞争、受蔑视、害怕被解雇、担心破产、收入不稳定，没有集体公约、流水线上的劳动、夜班、节奏紧张的劳动、每班八小时的三班倒工作、工厂的纪律、争逐的压力、在交通工具（火车、飞机、卡车、轮船）上的流动生活、肯定找不到一个固定的工作、做同一项工作必须干到六十岁而又没有提级的希望。金钱与所有这一切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金钱基本上是暂时的，而这些财富却是持久的。通过重新分配的办法可以使金钱方面的情况发生变化，就很好地证明了金钱方面的情况永远不是固定不变的。

在另一些情况下，通货膨胀、破产、失业也会使金钱方面的情况发生变化。但是非货币因素就不是这样。它们是永久性的：“既得权利”。谁能够象在金钱方面那样，把一些人的“既得权利”拿过来分给另一些人呢？而且有一些非货币因素还直接或间接地构成了金钱方面的好处。各种补贴和奖金、税务制度、公务住房和汽车（在法国至少有四十万辆公务汽车）、公务饭费开支（每年至少一亿顿公务饭）以及其他制度，都属于这类情况。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集体来说，这些所涉及的钱数都是相当可观的。

新的不平等不再仅仅是根据法国人个人财富或社会职业阶层来单个地分析他们，而是要分析各种行业集团：有一些行业集团是人数很少但拥有特权的（富有的继承人、公证人、药剂师、经理、财政局长等等），另一些行业集团则人

数众多但拥有的特权较少（例如粮食生产者、电工技师或铁路工人）。有一些行业集团是由在社会进步方面先进的部门或企业中工作的领工资者组成的，另一些行业集团则是集合了单干的劳动者（不管条件如何，是共同的利益组成了行业集团）。说到底，就是免税。所有这些集团只有一条原则：获得更多，更多的好处。

非货币因素目前的分配与金钱目前的分配同样是不公正的，但是它们的重新分配的原则不同。牺牲不再要求少数的富人作出，而是要求人数更为众多的普通的法国人作出。作为分配者的国家的对立面，不再是多少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个人，而是团结得非常紧密的各个集团。需要重新分配的东西也不再是由非常容易衡量的财富所组成（这些东西的所有权始终是可以改变的），而是非常难以估量的各种权利或者不利的规定（它们的占有权似乎是带有永久性的）。

既得权利的重新分配，现在是按照非常准确地反映出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的强权逻辑来进行的。它是社会结构的忠实反映。因为任何权利都只是根据施加压力的手段而取得的。各个行业集团所获得的权利反映了它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它们的组织能力。因此，任何想改变这些权利的行动都会遇到难以克服的障碍，因为当初能够夺得这些权利的手段，如今也能用来捍卫它们。

在非货币因素方面，人们所得到的东西是从来不会再被拿回去的。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重新分配，那就要冒发生严重社会冲突的危险：有哪一个政府在这一方面已经遇到了富人的猛烈反对时，在那一方面还能有勇气向那些强有力的行业集

团的利己主义进行挑战呢？

我们在初步分析过这些情况之后，已经可以对不平等总结出一些规律了：

——只有同时考虑各种货币的和非货币的因素时，才能够确定各个人的条件。

——要从行业集团和围绕着各种好处而组织起来的行业集团之间的密切联系，来观察不平等。

——每个人的条件都与他所属的行业集团的实力，以及他个人的能力相适应。这种实力主要取决于该行业集团施加压力的手段和它的组织能力，而不仅仅取决于有关者个人的能力或斗争性。

——非货币因素的重新分配，是按照在金钱方面进行斗争的规律相类似的规律而进行的，因为在一种分配办法中的不平等可能在另一种分配办法中也是不平等的。

——因此，货币方面的不平等通常都是因为非货币因素而扩大，而不是因此而得到纠正。

——领最低报酬者只有更加不利的非货币因素。

——人们听到谈论最多的行业集团，常常是那些收获最多的行业集团。贫穷者则是无声无息的。

——在危机时期，金钱贬值，而权利则升值，因此第二类不平等成为比第一类不平等更为重要的因素。

——货币方面的不平等的任何减小，都将增加非货币方面的重要性。

——近几年来，货币方面的不平等趋向于减小，而非货

币方面的不平等则趋向于增大。这些非货币方面的不平等为今后的重新分配提出了最严重的问题。

——需要为自己的利益进行辩解，而不是眼红其他人的利益的行业集团，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关于它们的各种好处的秘密。

我们将逐章地观察一下这些规律在我国社会中的应用。眼下，我们将利用这个小索引，走马观花地观察一下法国社会（这里指的是“变革”之前的法国），以便拿这个提纲同现实情况作一番对照。

第一，参观一下台芳斯区，这是巴黎的新商业区，拥有二十一世纪式的高楼大厦。这些现代化的进行繁忙工作的场所有一个神经系统：电话以及数千名忙碌的“小蜜蜂”，她们为使每一个人能找到自己的对话者而繁忙地工作着。“M公司为您服务……请您不要离开电话机……”统计学上的简便方法可能还不会把整个法国和纳瓦拉^①的所有女接线员归为同一类，但它肯定会把在台芳斯区工作、彼此相距只有数百米的这些女接线员归为同一类。可是实际情况怎样呢？

第一件使人吃惊的事情就是：她们的工资收入并不相同。在一九八〇年底，W大厦的女接线员每小时的报酬为三十一法郎，而F大厦的女接线员每小时的报酬只有十五点零六法郎。

第二件使人吃惊的事情是：她们的地位不同。在一些大厦里，电话接线人员拥有无限期合同的各种保险，每年五个

^① 纳瓦拉：西班牙的一个省。——译注

星期的带薪假期，增发第十三个月和第十四个月的工资，每年按工龄增薪百分之二等；而在其他大厦里，大家都是以一年合同期为基础被雇用的，从来不改成长期合同。这种不稳定的地位是不能享受到只有正式职工才能享受到的各种好处和保险的。

正象你不一定能想到的那样，W大厦的女接线员工资高，却又享受着各种社会保险；而F大厦的女接线员工资低，社会地位又脆弱。在这两者之间，统计学家大概将生硬地拟造出一种工资中等、社会福利条件中等的“巴黎地区中等女接线员”。

在现实情况中，或是这一类，或是那一类。如果这个女接线员成为雇用她的公司的一名正式职工，那她就会得到一份适当的工资和合乎情理的劳动条件；如果她只是被租用或临时被录用的，那她就不是她在其中工作的企业的正式职工，并且享受不到只有该企业正式职工所能享受到的社会福利。地位稳定而工资高，或者地位不稳定而工资低，正象人们所看到的那样，非货币因素是扩大了不平等，而不是纠正了不平等。

第二，在法国电力公司的一个企业食堂里。女服务员们是在同一个单位里干同样的工作，然而，……在对退休作出新规定之前，有一些人可以在五十五岁时就退休，而另一些人却必须继续工作到六十五岁。过去，作为电力公司正式职工的女招待员的电费可以按每一千瓦/小时四个生丁计算，但是不属于公司正式职工的食堂女服务员却要按通常的高价来付电费！

在巴黎地区的一个化工企业里，为了避免解雇，企业决

定派过剩的专业工人去当警卫。这项工作以前是由外边的一家公司承担的。只需要废除这个合同就可以了。那些守夜人丢掉了饭碗。这对于该企业和原来承担这项工作的公司都没有什么不便之处，原来承担这项工作的公司可以没有多大困难地解雇人员。该企业的专业工人将代替外部来的警卫，从而将保持社会安静。

但是人事处长发现，这样做的费用太贵了。这使人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使用本企业的人员本来可以省去付给外部公司的利润。但是新的警卫人员受到集体公约和企业合同的保护，而以前的老警卫人员却可以无情地随意使用。过去根本谈不上正常的夜班费和周末加班费的问题，谈不上任何随工龄而增加工资，谈不上付给第十三个月的工资等各种问题。本来一个外部警卫和本企业的专业工人基本工资差别也就是高百分之二十多一点，但是这么一替换，企业却要多花一倍的费用。

在这些初步的分析中，我有意识地选择了下层。警卫人员、集体食堂的服务员，以及企业的服务部门经常使用的那些没有人要的人：妇女、青年、外籍移民、没有专业技术的劳动者。过去这些人是挤在最广泛和最强大的行业集团里、分享到比他们更强大的人所获得的好处。但是由于危机，情况恶化了。没有保护能力的人被摒弃于各个行业集团之外，被抛弃在社会的边缘。这就是他们唯一的弱点，他们不能获得任何非货币因素的补助。因为非货币因素并不是用来补偿那些得不到好处的人的，而是用来奖励强有力的人的。

这是人们从危机以来在法国看到的总的趋势。我们以后将详细地谈论这种变化，这种变化给法国劳动界带来了一种

前所未有的彻底分裂的现象。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许多规律的具体体现：货币方面的不平等由于非货币因素而扩大了，报酬最低者还要加上完全不利的非货币因素，根据所属的行业集团不同，劳动条件也不同。

在上层，货币方面与非货币方面的好处可能是明显的不平衡的，尽管某些表象不是这样。

在下层，正是那些工资最低的人才缺少非货币因素。在高级干部中，情况正相反，正是那些工资最高的人最缺乏各种保障。他们工资高，有奖金，有实物方面的各种好处和提升非常快。从各个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都承认，“在私营部门，就业没有那么可靠，但收入却高些”。因此，对于持有同等毕业文凭的人来说，在私营部门比在公共部门工资高，但社会保险少。

对于这些高工资者来说，由于他们的条件好，而且不会受骗，所以货币方面和非货币方面的好处互为补偿的原则几乎得到正确的执行。然而，这种形势有可能突然发生变化。当那些报酬较低、但社会保险很多的领工资者可以毫无困难地渡过危机时，那些报酬较高、但社会保险很少的领工资者却要受到打击，如工资差距幅度缩小，职业更不稳定，最后还有对高收入的征税加重。如果这种发展变化持续好几年，就会出现一种重新分配。

在最富有的阶级中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些变动将愈演愈烈。

以我在政治研究学院的三位同学为例，这些都是真实的，它们说明了各种不同的情况。第一个人我叫他尼古拉·

P。沿着升学的道路，他进入了国立行政学院，毕业后他进入了行政法院。我一直认为尼古拉是行政技术人员的典范（我在这里不带任何贬意）。行政管理工作的使他感到厌烦，他向往权力。因此，他开始搞政治——行政管理工作，从这个部到另一个部工作着。数年内，当我每次遇到他时，他一会儿是科研部长的技术顾问，一会儿是合作部长的办公室主任，最后一次我碰到他时，他是一位国务秘书的办公室主任。他的仕途是正常的和光辉的，但却是与政治生活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蒂埃里·F在政治学院毕业后，还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一九六三年，他进入了一个大的雇主组织工作。由于他精明、勤奋、办事效率高，他树立起威信并获得成功，在十年的时空中，他成了该组织的秘书长。在四十岁时，他成了一个重要的、有影响的、获得了勋章的人物，他正准备到该商会的一家大公司中去任职。当然是去担任领导职务了。他的工资当然远远超过了一个行政法院参事的工资。

至于我当时不太了解的皮埃尔·T，我听说他后来进入了一个法定管理人事务所。我曾一度不知他的去向，但是后来我从报纸上看到他被任命为两件重大事务的法定管理人。这证明他领导着一个相当重要的法定管理人事务所，他的收入必定是非常丰厚的。

危机取代了繁荣时期。这几个人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只是对我的朋友蒂埃里·F的情况比较了解。七十年代初，他开始晦气了。在商会成员的利益争夺战中，他站错了队。由于站在失败者的一方，他被迫辞职了。他没有任何退职补贴